



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问题



张昌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干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中歧说多集中在青铜容器的年代上^①。虽然有学者已经指出大洋洲铜器“既没有商代前期晚段的二里岗上层期的铜器,也没有商代后期殷墟二期以后的铜器”^②,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属于年代跨度较大的不同时期,其主体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和以妇好墓为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二期^③。而关于大洋洲铜器年代上限问题,多数的学者意见比较一致,即认为大洋洲部分青铜器的年代较早,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

大洋洲青铜容器年代上限,涉及到如何理解南方青铜文明的兴起这一重大问题。在商时期南方地区发现的诸多铜器群当中,大洋洲铜器群具有明确的个性特征,说明大洋洲是一处拥有自身青铜铸造业的青铜文化中心。倘若我们能够确定大洋洲铜器群有一批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容器,则可间接证明大洋洲或赣江流域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已经拥有自己生产铸造青铜器的能力^④,换言之,南方青铜文明的起始时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认识的阶段早得多。若如此,我们对于二里岗文化这一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国家统治形式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都应该作重新的认识了。

但问题在于,大洋洲是否有一群年代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容器?

—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需要讨论影响年代的器耳立兽问题。在大洋洲青铜器中,扁足鼎、方鼎和四足甗等十三件器物的双耳上立有虎、鸟、鹿等动物形象。这些器耳立兽全部都是鼎、甗铸成后再铸接的,在相对年代上晚于主体。立兽中虎的数量最多,其纹饰具有大洋洲青铜器自身特征。根据这些纹饰风格一致的特点,可以判断立虎的年代大体相同,他们的年代在大洋洲青铜器中是较晚的,大部分的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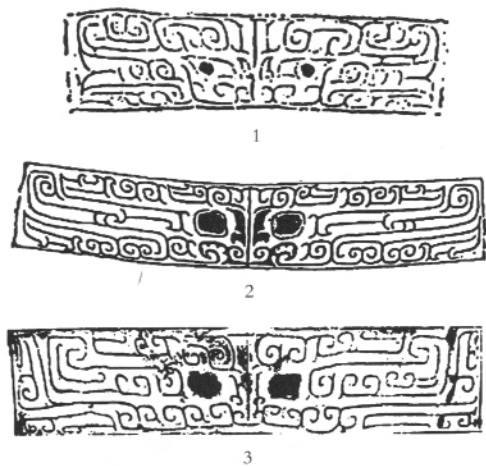
虎在外观上的呈色、质感也均有别于鼎、甗的主体。XDM: 12 兽面纹虎耳方鼎,立耳侧、顶分别饰有燕尾纹和云纹,铸接立虎时,连接处直接叠压在耳顶部的云纹之上。可见,大洋洲人对容器器耳后铸立兽,似乎并未经事先的设计,或者,立兽是在器物主体铸成之后加接的。无论如何,一件年代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鼎,也是可以再在殷墟时期再铸加接立兽的。换句话说,一件鼎立兽的年代晚,不能说明铸鼎的年代晚。因此,我们讨论大洋洲青铜器年代上限,应当撇开立兽这种年代较晚的因素忽略不计。

对于大洋洲哪些青铜容器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⑤,学者们的看法并不尽一致。例如邹衡先生认为属于二里岗的“有一件深腹圆鼎和一件三足提链卣”^⑥。发掘报告以为“有锥足圆鼎、大方鼎、兽面纹鬲、三足提梁卣等”。施劲松先生认定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器较多^⑦,有弦纹锥足鼎、浅腹锥足鼎、三件柱足鼎、斜角雷纹扁足鼎、鱼形扁足鼎、乳钉纹方鼎、两层方鼎和三件分档鬲。

一位学者认为某件青铜器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而另一位学者并未作相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的认识暗示,哪些被认为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其早期特征并不是十分明确。如果具体分析这些所谓较早的青铜器,除了弦纹鼎(XDM: 6)形制特征比较简单、时代不甚明确之外^⑧,我们会发现其他青铜容器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些年代较晚的特征。

以大洋洲乳钉纹方鼎(XDM: 8)为例。这件方鼎被较多学者认为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件方鼎可能是新干铜器群中最早的青铜器之一^⑨。的确,在大洋洲出土的六件方鼎中,乳钉纹方鼎是最为接近二里岗文化方鼎的:槽状的立耳、斗形的腹部、兽面纹和乳钉纹的布局 and 组合等等都不同于其他大洋洲方鼎而近似于杜岭张寨南街、向阳回族食品厂方鼎^⑩,特别是兽面纹是由阳线而不是带状

构成——大洋洲其他方鼎均饰带状兽面纹,符合二里岗文化时期大鼎或方鼎的兽面纹多是由阳线构成的纹饰作风。大洋洲乳钉纹方鼎的兽面纹作椭圆形目,长躯卷尾。纹饰的局部构图、线条的流畅程度等方面虽然与郑州出土的方鼎略有区别,但仍然可在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器如郑州或盘龙城中发现相似物(图一)。



图一

1. 郑州商城杜岭张寨 DLH1:2 方鼎, 采自《郑州商城》图 535。
2. 向阳回族食品厂 XSH1:1 圆鼎, 采自《郑州商城》图 538。
3. 新干大洋洲 XDM:8 乳钉纹方鼎, 采自《新干商代大墓》图 20。

但此方鼎明显有晚于二里岗文化的特征。如果说方鼎耳上时代特征较晚的虎, 因为后铸我们可以忽略不计的话, 那么方鼎足上部带扉棱的浮雕兽首则明确较晚。我们知道扉棱虽然最早已经见于郑州人民公园兽面纹大口尊^①, 半浮雕兽面纹在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甬也已经出现^②, 但乳钉纹方鼎鼎足兽面纹是以扉棱为中轴, 兽面纹的角部突起, 角尖上翘。这种兽面纹在造型上突出了表现力, 但同时对铸造技术有更高的要求。类似兽面纹在中原最早见于殷墟一期晚段的小屯 M331 方卣^③(图二), 而且直至妇好墓才开始有较多的使用。

在郑州属于二里岗文化最晚阶段的向阳回族食品厂和杜岭张寨南街的几件方鼎, 足部兽面纹均未作大洋洲乳钉纹方鼎足部这样的装饰。可见, 大洋洲这件方鼎并不能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它是一件年代较晚而延用早期作风的作品, 大洋洲另一件时代特征较晚的方鼎也有类似兽面纹鼎足, 正说明它在大洋洲的使用时间。

乳钉纹方鼎表述了这样一种情形: 大洋洲那些被认为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容器中, 一些早

期的器形、纹饰特征经常被强调, 但同时这些早期特征往往共生有较晚时期才会出现的特征, 而后者却往往被忽视了。

像乳钉纹方鼎那样装饰早期形式兽面纹的例子, 在大洋洲青铜容器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若作粗略地划分, 大洋洲青铜容器中占绝大多数的兽面纹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肖似郑州或盘龙城青铜器的带状和线状兽面纹; 第二类也是带状兽面纹, 但其纹带较宽, 凸出的纹带和凹下的阴地比例均匀, 纹饰的风格稍稍粗疏。这种纹饰代表性形态如兽面纹立耳方鼎(XDM: 10)等, 它们明显具有大洋洲自身特色, 但其来源应当是由前类纹饰分化而来。与此类纹饰风格接近的纹饰还有云纹、夔纹等, 他们有的装饰在大洋洲的工具等类器上。这种纹带布局均匀的纹饰在大洋洲最为多见, 反映出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纹饰对大洋洲的影响力最强。第三类是在时代特征上具有或接近殷墟文化特征的兽面纹, 如兽面纹壶(XDM: 46)、四羊瓿(XDM: 44)等, 他们只占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少数。第一类兽面纹涉及我们讨论的主旨, 除了前述的乳钉纹方鼎(XDM: 8)之外, 他们还有兽面纹柱足圆鼎(XDM: 1)、鸟耳夔形扁足圆鼎(XDM: 26)、双层底方鼎(XDM: 13)、两件三足提梁卣(XDM: 48、XDM: 49)等等一些。和乳钉纹方鼎一样, 这些饰有二里岗文化时期样式兽面纹的器物多伴生有较晚时代特征。以两件三足提梁卣为例, XDM: 49 卣颈部一周三组歧尾兽面纹, 这种椭圆形目的兽面纹在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之中具有较早的时代特征^④。但同时此卣腹部兽面纹结构复杂, 与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 H1 提梁卣纹饰近似, 而且大洋洲卣兽面纹两侧出现勾喙的鸟喙, 是晚于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的特征。XDM: 48 卣纹饰结构与 XDM: 49 卣接近, 但纹饰线条更为细密, 并在下腹饰有一周六组兽面纹——又一个属于殷墟文化时期的时代特征。实际上一周纹带饰六组兽面纹的做法在大洋洲其他容器亦可见, 如兽面纹柱足圆鼎(XDM: 1)、虎形扁足圆鼎(XDM: 17), 这些铜器年代特征都较晚。类似大洋洲提梁卣的器形最早见于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 H1^⑤, 但大洋洲两件提梁卣作三足, 这种设计罕见于整个商时期的郑州、安阳地区^⑥。大洋洲提梁卣的三足为后铸铸接, 虽然后铸技术在二里岗文化已经出现于盘龙城^⑦, 但大洋洲卣足的后铸仍然让人联系到大洋洲其他青铜器频繁使用的后铸技术。卣的足与腹结合严密, “其铸造工艺非常高超, 是这个(大洋洲——引者注)器群工艺技术的代表”^⑧, 这



1



2



3



4

图二

1、2 新干大洋洲 XDM:8 乳钉纹方鼎, 1 采自《全集 4》46, 2 摄自国家博物馆展览

3、4 小屯 M331 方卣, 采自《全集 3》, 图 133

种成熟的技术, 如果早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已在
大洋洲运用自如, 是令人怀疑的。

大洋洲那些被视为二里岗文化时期器物的圆鼎
和分档鬲, 其特征也常与二里岗文化铜容器有一定的
区别——往往是表现出较晚的特征。例如, 大洋洲
鼎、鬲较为厚重, 不似二里岗文化时期铜器轻薄; 大

洋洲鼎和鬲的足、耳位置关系多是双耳与双足平行,
我们知道这是晚至中商文化时期才完全成形的一个
作风, 而二里岗文化时期鼎、鬲基本都是一耳对一足
的位置关系, 后者也是判断一件双耳器是否是二里
岗文化阶段青铜器的一个重要标准。再以鬲为例, 大
洋洲鬲器形较宽矮, 没有二里岗文化时期鬲器形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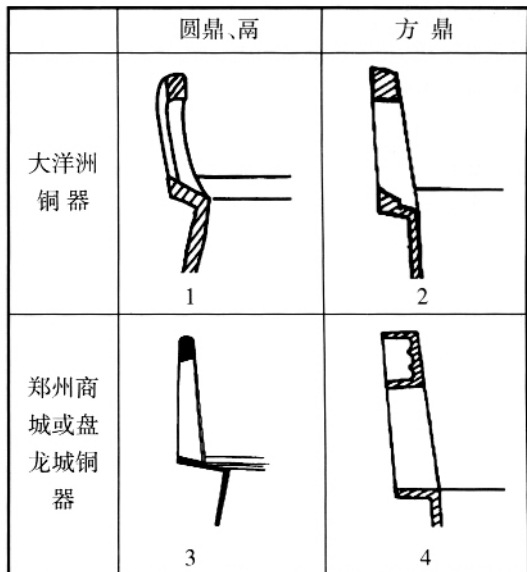
高、高尖锥足等早期特征;二里岗文化时期铜鬲基本都饰有“人”字形双线凸弦纹,这在大洋洲铜鬲中则一概不见。如果我们仅仅以大洋洲鬲分档空足的早期特征来判定年代,其结论是有问题的。

再以容器耳、口结合部作一个细部观察,进一步说明那些“早期”器的年代。众所周知,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容器一个重要特征,是鼎、鬲等多数器口沿外侧加厚^⑨,其功能一是用以加固口沿,二是有利于口沿与其上竖立的耳、柱等附件相互结合。这些加厚边的宽度往往与耳、柱的厚度一致,换言之,耳、柱的厚度只相当于口沿的一部分(图三、3)。大洋洲鼎、鬲等带耳器的口部常见两种形制^⑩,一类口沿斜折,其上直接接耳,见于绝大部分的鬲、圆鼎和少数的方鼎。那些被认为较早的鬲、圆鼎包括那件弦纹锥足鼎(XDM:6)都使用这一类的斜折沿。换言之,这些“早期”器并无二里岗文化时期铜器的那种加厚外边的早期特征。另一类口沿是折沿近平,口沿外侧加厚,见于大部分方鼎。不过,这些加厚边并没有与立耳协调一致,立耳的厚度是与整个口沿平齐!饶有趣味的是,二里岗的方鼎由于器形略厚,口沿一般并没有加厚。不难注意到,大洋洲容器口沿较窄而耳部较厚,因此几乎所有的立耳,其厚度都与口沿相同,这是大洋洲青铜容器一个显著的特征,也恰好是一个较晚的时代特征。在这种情形下,口沿的加厚边只是一种形式或装饰,而不是起到加强口与耳连接的作用。大洋洲的兽面纹分档鬲(XDM:32),在口沿上饰一周凹弦纹,从而表示出加厚边的意味,大洋洲那些带加厚边的方鼎也与此同类。因此,加厚边在大洋洲青铜容器上不是一种早期特征,而恰恰是他们晚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证据。

判断某一遗迹单位的年代,当以其包含的诸多器物及其他因素中年代最晚者为依据。判断某一器物的年代亦同理。这一简单的原则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并不容易被贯彻。在讨论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时,提出二里岗文化时期铜器论断的学者其实多已注意到哪些晚期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加倾向于将早、晚不同时代特征加起来取其中间值,表现之一如:“既然从体形上看具有早期特点而纹样风格又表现出较晚的作风,其年代当定在过渡期为宜”^⑪。将大洋洲青铜器年代上限前置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大约就有这样的思想背景。

二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即上述较晚的时代特征在大洋洲率先出现并对中原地区



图三

1. XDM:35 鬲, 采自《新干商代大墓》图 30
2. XDM:13 方鼎, 采自《新干商代大墓》图 24(A)
3. 盘龙城李家嘴 M1:1 鼎
4. 郑州商城 XSH1:8 方鼎, 采自《郑州商城》图 536

形成影响,因此这些特征只是在中原地区出现较晚、而在大洋洲却较早——甚至可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但如果相互比勘二里岗和大洋洲青铜器,这种假设成立的可能性较小。大家公认,大洋洲青铜器受到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的强烈影响,而后才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因此在大洋洲青铜器中形成的独特特征,并不会反溯而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综观大洋洲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如虎形扁足鼎以及带燕尾纹铜器,他们所表现出的年代特征均较晚,正是说明这些特征形成所需要的过程。另一方面,大洋洲青铜器中早晚不同的特征所反映的逻辑顺序,恰好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文化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发展相符。这说明大洋洲青铜器自始至终受到来自于中原地区青铜器特征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的强弱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将哪些所谓早期铜器上的晚期特征,一概归为大洋洲新出现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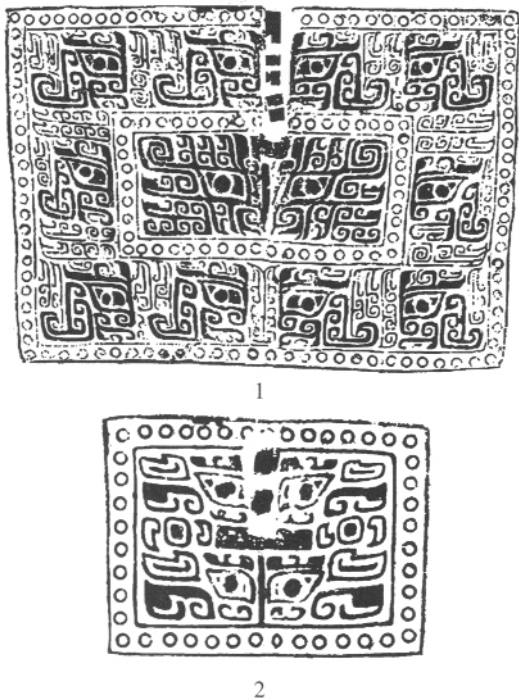
实际上,大洋洲青铜器往往会延用一些早期形制或纹饰作风。这种文化滞后现象从器形到纹饰、工艺诸方面,在大洋洲青铜器中不特是那几件被视为二里岗文化阶段的容器,而是十分普遍地存在。以下仅举数例:

大洋洲双耳簋(XDM:43)和豆(XDM:42)在纹饰风格上属于前述兽面纹的第二类,即它们都已形

成大洋洲自身文化特色,其铸器年代应当接近大洋洲墓葬年代。但两器器形均作假腹,表现出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器形特征。

兽面纹锥足圆鼎(XDM:4)三足外撇,足的形制接近锥形,鼎深腹,器形特征与二里岗文化圆鼎相同。但该鼎口沿外侧饰燕尾纹,上腹饰第二类兽面纹,因此该鼎作器的时间明显晚于器形特征。

从大洋洲青铜容器的纹饰看,大洋洲人装饰兽面纹有时似乎只是满足于兽面纹这一形式本身,而忽略兽面纹可能固有的含意。一件兽面纹虎耳方鼎(XDM:12)腹部兽面纹的布局是以一组兽面纹居中,四周围绕有单目的夔纹,这些夔纹明显是由兽面纹剖解析而来的(图四,1)。这种将兽面纹作为一种装饰的构件而不是像商文化中心区域那样将兽面纹作为主题,使这件鼎的纹饰在视觉上的怪异感取代了兽面纹原有的威严。兽面纹小方鼎(XDM:10)腹部深度虽只有5.6厘米,但其上每面纹饰都由上下两个兽面纹叠加(图四,2),这种布局同样不见于商文化中心区域。因此这些纹饰除了在结构上保留有兽面纹的部件之外,其他方面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重新组构的兽面纹的基本部件,基本都保持有二里岗文化时期特征。



图四

1. XDM:12 兽面纹虎耳方鼎,采自《新干商代大墓》图 22(C)

2. XDM:10 兽面纹小方鼎,采自《新干商代大墓》图 23(B)

在铸造工艺方面,大洋洲青铜容器大量使用后铸法,铸接器足、提梁、立兽等附件^②,同时,这里也较多使用先铸法铸造鼎类器的扉棱。这两种工艺同时频繁并用,在当时商文化的中心区域也不多见,说明了大洋洲青铜铸造水平。但是在另一方面,大洋洲青铜容器的铸造也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大洋洲青铜容器大量使用垫片^③,但从公布资料看,这些垫片中有的实际只是对自带泥芯撑时留下孔洞的补铸^④,这是二里岗文化时期垫片技术未能成熟时的一个表现,但在大洋洲仍然得以延用。大洋洲青铜容器似乎也一直未能解决三足器的足内置泥芯问题,因此大洋洲青铜鼎、高等器足都是作空足的形态。典型如兽面纹小方鼎(XDM:10),该鼎通高 13、足高仅 4.8 厘米,鼎饰具有大洋洲特点的兽面纹,年代特征较晚,但该鼎仍然为空足。在商的中心文化区域,二里岗文化时期三足器使用空足,但在殷墟文化第一期已经在足内置泥芯、使足与腹之间形成封闭的器底(大型鼎足仍然是空足),其例如小屯 M188 鼎、小屯 M331 鼎^⑤。

种种迹象表明,大洋洲青铜器中包含的二里岗文化因素的成分,只是大洋洲人在晚期对早期作风模仿的结果。这种模仿因此往往会包含有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的——忠实于原形或加以发挥的——成分。考虑到上述现象,我们再审视大洋洲哪些被认为早至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恐怕不能说他们是早期铜器包含有晚期特征,而应当是较晚的青铜器延用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

其实,殷墟时期南方其他地区的一些青铜器也常常带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一些特征,较典型的如南方地区出土的尊和罍,在器形、纹饰等方面都保留有早期特征^⑥。那么,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何以在大洋洲乃至南方地区青铜器出现有如此之多早期或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特征?

不晚于二里岗下层文化阶段,商文化势力即南渐至赣北地区,这一势力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进一步得到加强,九江神墩^⑦、龙王岭遗址^⑧以及瑞昌铜岭矿冶遗址^⑨展示出商文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随着中商文化时期商文化势力的北撤,中原文化因素对南方大部分地区的直接影响突然减弱。大约在此前后不久,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相应地开始兴起。这一文化格局使得当地地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往往仍然是停留在此前所中断的二里岗文化因素上。除了大洋洲青铜器有这种表现之外,吴城文化的陶器特征也大体作如此变化^⑩。

我们说大洋洲青铜器年代上限在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说法有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地区文化不可能拥有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实际上,大洋洲青铜容器中浓厚的二里岗文化时期铜器因素,本身就说明大洋洲的青铜工业与二里岗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无论是吴城还是大洋洲,像盘龙城遗址一样出土商文化的青铜器完全是可能的,只是这种青铜器与其后大洋洲墓葬青铜器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上述分析不误的话,我们似乎可以对本文开始预设的问题作出这样的理解: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可以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大洋洲铜器群只是较多地接受了二里岗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因素保持下来。因此我们当然不能证明大洋洲已经具备了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大量生产青铜容器的能力。

附记:国家博物馆2006年3~8月举行了《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笔者得以观察这些青铜器,并因此与史可安(Kyle Steink)有许多的讨论,文中的一些想法或受益于这些讨论。

注释:

① a. 邹衡:《有关新干出土青铜器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0年12月6日第3版。b. 张长寿:《记新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7日第3版。c. (日)林巳奈夫:《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刍议》,《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② 孙华:《关于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3年第7期。

③ a.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b. 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第一章第89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近年来认为大洋洲青铜器年代较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结语第416-417页暗示大洋洲青铜器年代在吴城文化三期早、晚段之间,即相当于殷墟文化三、四期之间。

④ 例如安金槐先生认为大洋洲许多青铜器与二里岗青铜器相同,认为“二里岗上层时,中原地区和江南赣江中下游地区,在铸造青铜器方面,也有着许多相同之处”。暗示二里岗文化时期新干已经有自铸青铜器的能力。见安金槐:《新干青铜器的重大发现揭开江南商代考古新篇章》,《中国文物报》1990年12月20日第3版。

⑤ 关于二里岗文化时期年代的下限,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致。本文以郑州商城、盘龙城青铜器为二里岗文化

青铜器代表性铜器群,以向阳回民食品厂、杜岭张寨南街窖藏青铜器为其标志性铜器群。这与本文所涉及学者的认识也大体一致。

⑥ 同注释①邹衡文。

⑦ 同注释③施劲松文。

⑧ 但该鼎的形制特征仍然更接近殷墟第一期的三家庄青铜器。参孟宪武:《安阳三家庄、董王度村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其年代推定》,《考古》1991年第10期。

⑨ 贝格立认为此鼎“可能是墓葬中最早的”。但他同时注意到方鼎足上浮雕兽首应当较晚。Robert W. Bagley, An Early Bronze Age Tomb in Jiangxi Province. Orientations, Volume 24, July, 1993. 因此他并不认为该鼎可能早至二里岗文化时期。

⑩、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58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彩版14-16,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⑪ 同注释⑩彩版32。

⑫ 如郑州商城C8M2:1罍,同注释[10]彩版35;盘龙城PWZM1:2罍,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彩版9,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⑬ 《中国青铜器全集3》,图133。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⑭ 张昌平:《盘龙城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⑮ 类似三足提梁卣见于城固卣。参《中国青铜器全集》1图143,文物出版社,1996年。但城固卣三足为浑铸,与大洋洲卣后铸不同。

⑯ 盘龙城青铜器如李家嘴M1簋的双耳为后铸铸接。

⑰、⑲ 苏荣誉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附录九,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⑱ 例外的情况是方鼎,其口沿多作平折沿,耳与器口的厚度相同。

⑲ 这里不包括鬲、三足甗、折肩鬲等少数几件耳结构较特别的情况。

⑳ 同注释③《新干商代大墓》第190页。

㉑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祭祀坑的神坛、神树的铸造也大量地使用了后铸法,这种联系是值得重视的。

㉒ 如兽面纹分档圆肩鬲底部中央的补铸痕迹。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粹》第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㉓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小屯》第一本《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上》,台北,1980年。

㉔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尊与罍》,《考古学集刊》

(下转第116页)

①9 a.熊建华:《湖南邵东出土一件西周四虎铸》,《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b.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第52页图1·2·1,大象出版社,2006年。

②0 a.高至喜:《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西周青铜乐器》图版捌:3,《湖南考古集刊》第2集,岳麓书社,1982年。b.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第54页图1·2·2,大象出版社,2006年。

②1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第45页图1·5·11,大象出版社,1999年。

②2 高至喜:《论商周铜铸》图二:8,《湖南考古集刊》第3集,岳麓书社,1986年。

②3 高至喜:《论商周铜铸》图二:5,《湖南考古集刊》第3集,岳麓书社,1986年。

②4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图版》第388页铸2,吉川弘文馆,1984年东京。

②5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第107~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②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1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7 彭明瀚:《吴城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②8 这一类铜器林巳奈夫称为“地方型”,贝格立等称为“南方青铜器”,南波纯子称为“华中型”。

②9 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铜乐器》,《文博》1987年第2期。

③0 陈邦怀:《铸铸简介》,《文物》1972年第6期。

③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第11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③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第259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③3 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③4 李学勤:《吴虎鼎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

③5 刘启益:《西周纪年》第385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6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451页,巴蜀书社,2003年。

③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

③8 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

③9 俞伟超:《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3、14合期,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④0 宝鸡市博物馆卢连成等:《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铸》,《文物》1978年第11期。

④1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第214页,图5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④2 笔者访问所见,图见该馆编《MIHO SUZUME》一书。

④3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④4 李零:《春秋秦器试探》,《考古》1979年第6期。

(上接第107页)

第15集,2004年。

②7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②8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江县龙王岭遗址试掘》,《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②9 刘诗中、卢本珊:《江西铜岭铜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③0 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此外,在李伯谦先生列举的吴城文化第一期青铜器中有刀、凤首铜器盖。不过现在看来,该器盖的云纹与具有新干特色的纹饰相同,可知其年代当不早于吴城文化第三期。